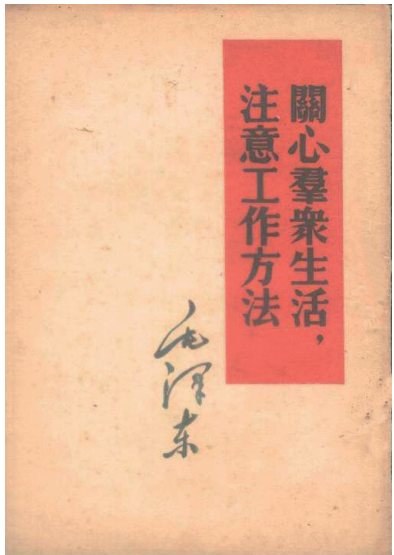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时时查民情 事事解民忧

——重温毛泽东《关心群众生活，注意工作方法》

□ 朱凤强



1934年1月27日，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，毛泽东根据对长冈、才溪两个乡的调查状况，结合根据地的发展实际，作了《关心群众生活，注意工作方法》的报告，报告要求共产党人要关心群众的痛痒，改善工作方法，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。在新时代，重温这一讲话，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群众的生活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

从1930年11月开始，国民党为了消灭苏维埃政权和红军，连续四次对中央根据地大规模“围剿”，同时在经济上实行残酷的封锁政策，妄图使苏区“无粒米勺水之接济，无蝼蛄蚂蚁之通报”，苏区的经济因此遭到了严重破坏，红军的给养和群众生活也遇到了极大困难。在苏维埃政权内部，受“左”倾思想的影响，在根据地经济建设问题上，存在着两种极其错误的观点，许多同志认为“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，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”，还有的同志把经济建设视为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，脱离革命战争搞经济建设，这两种错误观点极大地妨碍着根据地的发展。

针对上述困难和问题，毛泽东明确指出，土地革命的中心任务，就是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，以革命战争打倒国民党，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，其他工作必须围绕这一中心而紧密地开展起来。因此毛泽东在文中强调：“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”，“那末，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，群众的生活问题，就一点也不能疏忽，一点也不能看轻”。这是“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，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，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”。

核心阅读

《关心群众生活，注意工作方法》是毛泽东阐述党的群众路线思想的经典著作之一。在文中，毛泽东批判了关于根据地经济建设问题的错误观点，分析了发展生产、关心群众生活同支持革命战争的关系，要求共产党员关心群众生活、注意工作方法。重温这篇著作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会党的群众路线的精神实质，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。

毛泽东认为，群众的生活问题与革命战争的胜利息息相关。他指出，如果我们不去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问题，就会使革命战争缺乏必要的物质保障，就会削弱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。如果群众连自己的生活都得不到切实的保障，他们就不可能拿出全力去支援前线，也不可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去支持、参加革命。因此他一再告诫全党：“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？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？那末，就得和群众在一起，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。”

从关心群众的痛痒做起

如何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，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？在毛泽东看来，就要从关心群众的痛痒做起。他指出：“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，从土地、劳动问题，到柴米油盐问题。”毛泽东以身作则，亲自到乡村调查研究，了解工农群众遇到的生活困难，如“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，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？小孩子要求读书，小学办起了没有呢？对面的木桥太小，会跌倒行人，要不要修理一下呢？许多人生疮害病，想个什么办法呢？”对于这些琐碎小事，毛泽东强调，“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，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”。他要求共产党人要放下身子，走向农村田间，走进人民群众，时刻了解每一名群众的生活状态，发现群众的痛痒，找到群众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，正如长岗乡的群众所说，“共产党真正好，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”。

发现群众的痛痒后，就要解决群众的困扰，为群众谋利益。毛泽东认为，要得到群众的拥护，让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支持革命，共产党人还要做很多工作，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：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，分土地给农民；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，增加农

业生产；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，吃饭问题，住房问题，柴米油盐问题，疾病卫生问题，婚姻问题。总之，要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。他指出：“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，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，应该讨论，应该决定，应该实行。”要让群众认识到共产党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，“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”。

毛泽东勉励大家，只要共产党人能关心群众的痛痒，为群众谋利益，那么“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，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，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”。这样我们不仅能够粉碎国民党的堡垒政策，还能建立自己的铜墙铁壁。因为在毛泽东看来，“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？是群众，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，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，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，完全打不破的”。

工作方法的问题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

毛泽东认为，革命党人不仅要根据群众的痛痒提出工作任务，而且还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。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，在落实党的政策中出现了两种现象，有些地方的苏维埃机关敷衍塞责甚至强迫命令，导致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僵化，大大地阻碍了各项任务与计划的执行，而另一些地方的苏维埃却与群众打成一片，工作取得很大成绩。毛泽东指出，这与工作方法密切相关。他用过河与桥或船的关系，生动地说明了工作方法的重要性：“我们的任务是过河，但是没有桥或者没有船就不能过，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，过河就是一句空话”，“不解决方法问题，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”。因此他告诫大家：作为一名群众生活的领导者、组织者，不仅要提出任务，而且要注意解决任务的工作方法。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三种工作

启示：一是实现中国梦，要学党史国史，汲取党史国史精华，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撑；二是实现中国梦，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，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，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，始终坚定道路自信；三是实现中国梦，要紧跟中国共产党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追寻梦想的过程中诞生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历史；四是实现中国梦，要依靠中国人民，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，人民群众是实现中国梦的主体，只有依靠人民实干苦干，才能梦想成真；五是实现中国梦，要弘扬中国精神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，以凝聚全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共识；六是实现中国梦，要建设强大国防，强大国防是实现中国梦的可靠保障，要坚持政治建军、改革强军、科技兴军、依法治军，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。

作者将行文的落脚点置于中国的现实发展，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重要论述，结合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投身革命、建设、

方法。

一是要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。毛泽东发现，有些工作人员只讲扩大红军、扩充运输队、收土地税、推销公债，而对于人民群众的柴米油盐等生活问题，却不闻不问，一点也不讨论，致使会议难以召集、工作取得极少成绩。因此毛泽东指出，必须反对官僚主义，只有克服官僚主义，才能更好地动员群众和宣传群众。他要求工作人员要加强调查研究，了解群众痛痒；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，与群众打成一片；对工作效果“应该检查”，切实为群众谋利益。

二是要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。所谓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，就是反复做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，解决他们的思想顾虑，使他们明白革命工作的意义及其与他们自身的关系。而命令主义，实际上就是不相信群众，不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，而只靠少数工作人员的单干，其结果往往导致革命事业遭受损失，造成党与群众的隔阂。因此，要动员群众拥护革命工作，就必须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，启发群众的自觉，调动群众的主动性，才能把事情办好。

三是以先进带动落后的工作方法。毛泽东非常重视培养干部，他认为，在工作中，要注意培养和爱护同志，帮助不会做工作、缺少工作方法的同志改进工作。他指出：“一切我们领导的地方，无疑有不少的积极干部，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很好的工作同志。这些同志负担着一种责任，就是应该帮助那些工作薄弱的地方，帮助那些还不善于工作的同志做好工作。”这样就可以实现先进的地方更加先进，落后的地方赶超先进的地方，就能“把最广大工农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政府的周围”，实现革命在全国的胜利。

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，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：“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，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”，“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”，“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，一年接着一年干”。重温毛泽东这篇体现了群众路线精神的重要报告，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，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积极意义不言而喻。

重读经典



改革的生动实践，阐述了实现中国梦的现实方略和路径。作者认为，中国梦的实现，不仅是对中国古代盛世文明价值的历史性超越，同时也是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价值的总体性超越，对于开拓民族复兴伟业新境界，将产生长期深刻影响。

图书推介



□ 陈小娟

『书虫』钱钟书

钱钟书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文化巨人。他的成就既有来自天赋的因素，更是他勤奋苦读的结果。

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一位极其保守的儒家学者。在钱钟书出生前五年，清廷就已经废除了科举制度，但他仍希望他的子弟也像他自己一样能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。所以钱钟书从识字开始就未脱离过正统的儒家教育。他后来回忆道：“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，经、史、‘古文’而外，有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心焉好之。”据钱钟韩回忆说，当他们两人在东林小学读书时，每天下午放学后，父亲就要他们去他办公室自修或教读古文，等到在校学生晚餐后，才带兄弟俩回家。回家后，除学校规定的作业外，还得读古文名著。

中学期间，钱钟书读书非常用功，文章写得很好。常为父亲口授代书，代笔写信，甚至捉刀著文。杨绛回忆说，当时“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（《国学概论》），上有钟书父亲的序文。据钟书告诉我，那是他代写的，一字没有改动”。其时的钱钟书为清华大一学生，还不到20岁。

清华藏书之富，在当时各大学来说是数一数二，中外古今图书无不应有尽有。学生还可以到书库里去看书，免借还之劳。来到清华，钱钟书宛如如鱼得水。“此中乐趣，不可形容，恐怕只有饥鼠入太仓之乐仿佛似之。”据同学回忆，钱钟书是在校借书最多的一位。

1935年，钱钟书携杨绛前往英国牛津留学。留学期间，他们把牛津总图书馆当成了第二个家，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“饱蠹楼”。饱蠹楼藏书500万册，手稿6万卷。他们尽情地畅游在书海之中。

钱钟书对书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。1939年，他为了要照顾老父，决定辞了西南联大教职，到湖南安化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。当时处于抗战时期，交通不便。据同行的邹文海回忆说：“抗战初期，交通工具不敷分配，沿途旅客拥挤非凡，无法按时间到达目的地，我们10月就从上海订船票赴宁波。继而日人封锁海口，不有通航，一直到11月初才得到船公司通知，定期出发。到达宁波后，大家松口气，方感真正脱离了敌人的魔掌。从宁波到溪口，一节乘汽油船，一节乘黄包车，足足走了一天，此后则全部坐长途汽车，每站都得停留三天五天，不是买不到票，就是等待行李到达，没有一站是顺利通过的。”中途，大家利用候车时间就近游玩，但“钟书君却依然怡然自得，手不释卷。我走近去查究他看的是什么书，方知他翻的是英文字典。‘哦！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，竟可捧在手巾一月’。……我那时才知道钟书君博闻强志，积学之深。”

在蓝田的生活单调而刻板，但对喜欢读书的钱钟书来说，却是一件好事。没有什么外务来打岔，可以专心致志读书或写作。他除了教学任务外，整天埋头读书，足不出户，一般上午习书，下午练字，临写草书，晚上则在油灯下看书、写作。偶尔与好友们聊聊天。《谈艺录》就是这个时候写的。

钱钟书读书喜欢在书上眉批及划线。他清华读书时的同学回忆说，“他有一个怪癖，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笔画下佳句，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，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多都是出自此君之手笔”。“他（钱钟书）起劲时，图书馆库里的书，逐排横扫。他喜欢把书里精彩或重要的部分，在旁边用粗铅笔画上竖线。可惜我当时没有学乖，否则只去找他画有粗黑线的部分读，也可以省事省力多读很多书。”

钱钟书读书时喜欢做笔记。这

个习惯据说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读书时养成的。因为图书馆的图书不外借。到那里去读书，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，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，只能边读边记。他一生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，其笔记大概分为三类：一类是外文笔记，笔记本共一百七十八册，还有打字稿若干页，全部外文笔记共34000多页。一类是中文笔记，其数量与外文笔记差不多；第三类就是“日札”——他的读书心得。日札共二十三册、2000多页，八百零二则。这些笔记，不仅是钱钟书读书的收获，更是他一生奋读的足迹和记忆。

钱钟书读书时还喜欢“刨根问底”。他一生读书无数，他阅读书籍所写的札记，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。他治学严谨，读书时也不肯放过一个疑点，一旦遇到，定要多方考证，弄个水落石出。有一次，他在读清代袁枚的《随园诗话》时，看到里面有一处讲毛奇龄批评了苏轼的诗句。文中说，毛奇龄针对苏轼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这句诗说法不对，“定该鸭先知，难道鹅不知道吗？”对此，袁枚认为照毛奇龄的看法有问题。因为如果顺着毛奇龄的思路看《诗经》里的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一句的说法应该也是错误的，难道“河之洲”上就只有雎鸠，而没有别的什么鸟吗？对于袁枚和毛奇龄的这场笔墨官司，钱钟书没有略过，而是决定考究一下到底孰对孰错。于是他找出毛奇龄的《西河诗话》卷五本来，发现毛奇龄的原意是说苏轼的那句诗是摹仿唐人张渭的诗句“花间觅路鸟先知”而来的，但摹仿得拙劣。在花间寻路，鸟比人熟悉，所以鸟比人先知。而是凡水中的动物都能感觉到冷暖来，如果只说鸭先知，就有些勉强。显然是袁枚弄拧了毛奇龄的意思。然而，难道苏轼的诗句真的只是唐诗的简单照搬吗？他找来苏轼的原诗《题惠崇春江晚景图》来看，发现原来苏轼的这首诗是题在一幅画上的，画面上有竹子、桃花、春江，江里有鸭子，所以写“鸭先知”。看来苏轼也没有错，是毛奇龄错了。探究到此还不算完，他又找出了张渭的原作《春园家宴》，鸟先知路是一种写实手法，而苏诗中的鸭先知水暖，是在写意，意在抒发诗人对春光的赞美。由此，应该说，苏诗的“鸭先知”比张诗的“鸟先知”更绝。到此，钱钟书才最终下了结论，认为毛奇龄是错误的，说他“不懂得东坡苦心”。

“书癖钻窝蜂未出，诗情绕树鹊难安”“晨书暇写细评论，诗律伤严敢市恩”，这是钱钟书对自己读书生活的最好写照。



探讨中国梦的方略和路径

——简评《中国梦的历史探究及当代启示》

□ 田国良

王国奇教授编著的《中国梦的历史探究及当代启示》一书是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探讨中国梦的力作。该书以中国梦为主题，从史论两方面探究中国梦的历史演进和实现路径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参考资料和辅助读本。

该书分上下两篇。上篇“中国梦的历史探究”，对古代中国的太平盛世梦、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梦、现代中国的民族独立梦作了全景式描摹，从历史的逻辑推演出当代中国伟大复兴梦的内涵，即从“站起来”、“富起来”到“强起来”的梦想。作者娓娓道来，让一代代中国人的逐梦之旅映照出时代的光华，同时阐释了中国梦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基因。作者认为，实现民族复兴，并不是所有民族都会提出的课题。过去不曾辉煌，复兴从何谈起？只有中华民族这样曾经繁荣兴盛的民族，才有资格提出复兴目标；只有中华民族这样自觉担负历史使命的民族，才勇于提出复兴目标。

下篇“中国梦的当代启示”，通过对中国梦的历史探究概括出六点